

中国传统哲学的 思维特质及其价值

高清海

“人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接主题，否认了人性可以成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也就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质。与西方哲学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不同，中国哲学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中国哲学讲求“悟道”，通过“道”的把握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实际上，哲学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任务），它只是一种如何在现存世界贯穿人的观点、人的态度、人的理想的标尺，以及如何进一步升华人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在这点上，中国哲学的表达方式显然是有优越性的。

关键词 中国传统哲学 “道” 形而上学 人性

作者高清海，1930年生，吉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对于“哲学”，人们总是依据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从来没有为大家共同认可的统一定义。不仅如此，哲学的性质，包括哲学的对象和范围，都从无定论。现在人们所说的“哲学是世界观”，并且常常以“本体论”作为哲学内容的核心，这种看法是从“西方哲学”引申来的。其实，追究西方的历史、尤其是在当代，他们叫做哲学的理论也并不尽然如此。按照西方“本体论”的标准，不只中国没有哲学，整个西方以外的民族，乃至对西方当代的哲学都会提出疑问。日本曾经有过“日本有哲学吗？”的争论，西方当代也出现了“哲学死亡”的论调。

哲学在这点上非常特殊。在各类学问中，惟独哲学是这种情况，其他的学科至少在学科性质和对象规定上人们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为什么会这样？哲学为什么这样特殊？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正是反映人的特有本性，表现了人性的多维性、多面性和多变性的特点。我们冷静去观察就会看到，哲学的性质可以不确定，哲学观点可以分歧到彼此敌对，哲学的内容可以广泛到无所不包，然而哲学理论围绕的轴心、生发的基点却是明显的，这就是人、人的生存、人的本性、人的生存世界和人的生活意义，总之离不开“人”和人的生存活动。人的本性是“自为本性”，自为本性就意味着，人不仅必须领悟自己的存在，而且还需要自己去规划自己的生活、自己去预设自己的存在前提并创造自己的未来。在这一意义上说，“哲学”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理论，哲学表达的——不论它指向哪里——都是人作为人而有的对于生存、生活、世的态度、理解、观点和追求。由于人性是未定的，始终处于生成和展现自我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哲学也具有同样不定的本性。

果真如此，关于“有无哲学”的提问就不是合乎什么样模式的问题，合理的提法应该是追问：人性是否进入了觉醒，有没有表现或表达人生、人性、人的理想追求的自觉理论？如果有，那就应当叫做哲学，不论它的表现形式如何，也不管它有无哲学的名称。人作为人都有人性，至于人性达到的觉醒程度、展开的具体内容、表达人性的方式，那是可以有很大不同的，这就是不同民族哲学的差别。尽管“哲学”缺乏固定模式，谈论的问题差异很大，有时甚至是“南辕北辙”，那也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这里的根基就在彼此有着相通的“人性”。

哲学理论的形成，要受多种条件制约，所处历史条件不同，形成的理论便有很大差别，初始差别一经确立为传统，就会影响整个后世理论。这就是不同哲学思维方式——中西哲学差别的原因。至于初始差别究竟是怎样造成的，这点很像民族语言的差别，常常难以完全说清楚。我们暂且放过发生学的问题，直接去看中西哲学有什么不同。

在我看来，无论西方或中国，“哲学”的基点都在人的生命活动中。二者的差别只是表现在：西方关注的主要是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这使它从一开始就把“智慧”引向了认知的方向，从“对象意识”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相对区分来说，西方讲求“知物”，以“有”（存在的“实在性”）为起始；中国讲求“悟道”，以“无”（生命的“生成性”）为开端。知物，是为了满足生命、实现价值；悟道，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知物需要用“眼”去看；悟道需要用“心”体认。用眼看（观），是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分离为前提的；用心体认（悟），则以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人性与物性的融通一体为基点。这就是它们的思想分野，中西哲学迥然不同的思维特质和理论风格便是由此形成的。

人的自为本性使人永远处在奔向“人”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人是不会满足于既成的存在和既有的生活的，总要追求更新的存在，奔向更高的生活，从有限进入永恒。这就是人的不断超越自我的“形而上学”本性。人的本性反映在哲学上，形成了哲学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人对自身存在和本性的终极信念和关怀，它是使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最高精神支柱。哲学在本性上就属于形而上学理论，这是哲学与科学理论的根本区别，无论西方哲学或中国哲学，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它们表达的方式有根本性区别。

西方从认知思维出发，采取了“本体论”的表达方式。按照这种方式，哲学家们在“现象世界”之上、之外，构想了一个本源性和终极性的“本质世界”，他们以概念的逻辑体系形式建构这个世界，也以此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的理想和追求。在西方特定的条件下，这种理论曾经起过推动科学进步、促进人性解放的历史作用，但它的理论困境是很明显的。中国哲学属于另一种思路，我们是通过“道”的追求来表达人的超越性理想和形而上追求的。道，是中国文化之根，它构成了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模式、伦理观念、审美意识和价值理想。道不属于西方式的本体，但具有化育万物、终极本源的性质和作用。按照古人的观念，道无所不在，是一切存在的本根，万象变化之源泉，它贯彻于万有之中，又具超越万有之性，如《管子·心术下》所述，道在大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从大处说，道通贯万物，“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①，道是一，是大，是全；从小处说，道生化万物，万有各物各性，它又是多，是异，是生。论其存在，道是实有，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论其性质，它又无形无象，属于那种“视之不

① 《老子》第五十一章。

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①的无。道就是这样一种以生命为本性的有和无的统一。

同样表达人的超越本性和形而上追求，西方以本体论方式，把超越现实的本质存在变成了独立于感官世界之外的“概念世界”，走的是外在性的超越路子。中国的道论同样肯定无形存在，但这个无形的本性并不脱离有形存在。道对物的超越是内在性的超越，属于既内在又超越的一体性关系。就这点来说，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理论”，我认为中国的表达方式是有优越性的。

表面来看，西方以概念逻辑体系形式给出的本体世界，是很明确、很实在的，甚至可以标榜那是“绝对真理”的发现。而在实际上，它愈是“明确、实在”，愈是显露出了矛盾。本体作为超验性的自在存在，它与现象世界即经逻辑地分割成的不同世界，它们之间如何去沟通，人们如何去把握这个世界，本质世界又怎样对现实生活起作用，这些就成为可以说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这里的矛盾还在于，形而上学属于超科学的理论，试图用科学理论的概念方式去把握超科学对象，这就不能不使自己陷入悖理的矛盾。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世界被割裂为二的结果，一方面，人被封闭在了“自我”观念的屏障之内（所谓“现象世界”）；另一方面，物又被限制于“自体”的不可知领域（所谓“物自体世界”）。在西方上千年的发展，关于本体、本体世界争论不休，得出的结论却是“不可知”，这就是它的困境。由于“本体论”的这一理论矛盾，于是引出了后来“认识论”的争论、“语言学”的转向，“本体论”随之便走向瓦解。在西方，按其固有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瓦解，也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终结，所以在当代（所谓“后现代”思潮），“哲学”自身也跟着陷入了危机。

中国哲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古老的《周易》采取的是意象表达方式，叫做“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②。按照孔子的解释，圣人观物取象，主要是为了“立象以尽意”。哲学作为理论思想，当然不能不使用言辞和概念。中国哲学的概念不是西方式的逻辑“范畴”，也就是说，它不是靠概念体系中的逻辑关系来规定内涵的，而是对事物自身内在关系的直接表征。例如，道、仁、义、理等概念，它们也是思维高度抽象的结果，但并不脱离它们所由来的血肉根基，而且只能从它们的来处才能体证、把握其思想内涵。概念、言辞，是为了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古人讲究“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③，这就是中国哲学注重义理性的意象思维，它属于人的觉悟理性。

中国哲学论著缺乏严整的概念系统，多用格言、比喻、例证的方式表达思想，使用的概念又都没有明确定义，只能靠人们自己去领会和体悟。习惯于西方哲学思维的人对此很不理解。如果我们了解了哲学既不同于宗教又有别于科学的形而上学本性，我们就会明白，哲学给出的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这是科学的任务），只是一种如何在现存世界贯穿人的观点、人的态度、人的理想的标尺，以及如何进一步升华人性、提高人生价值的精神意境。这样的理论，是不能使用定义的，一旦规定了定义，就把它框死了，就会使它失去现实的“活”的内容。从另一方面说，“定义”属于概念关系的界定（种概念、属概念之差），只有把事物的本质关系抽象化为独立的概念系统，像西方哲学那样，定义才是可能和需要的。中国的道、仁，作为意象性和意境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并非体现于概念关系，而是体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和面对的具体事物之中。把握这样的概念，不能靠定义，必须从人的身体力行中去领悟、体认。所以在中国

① 《老子》第十四章。

② 《周易·系辞上》。

③ 王弼：《易略例·明象》。

哲学中认识与实践行动是统一的，它特别重视个人的修养，强调“心”的领悟作用，以致把求真与得道、穷理与尽性、致知与崇德往往看成一回事。个人体悟不像从定义理解概念，当然会有一些的难度，然而一旦达到悟解，人们就会自觉地、灵活地并富有创造性地去发挥和运用，并且一生受用无穷。

这里我们看到，对哲学的“形而上学”实际上有着两种不同理解。西方把“形而上”看作与经验对象分离，可以单独认识、或者单独存在的一种实体性对象，该词在西方的本来含义是“在物理学之后”，就体现了这点。西方的本体论哲学及其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都与这种理解有关。中国的理解不同。“形而上”原词出自中国的《易经》，那上面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①的说法。中国后来讨论过道器、理气种种关系，主流思想都认为，道不离器，如王夫之所说，“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②在我们的观念中，有形与无形、形上与形下并不是分别存在的，我们是从有形去把握无形、从形而下去理解形而上的。这既是中国哲学的特有品格，也可以看作是“哲学”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康德明确地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③，所以他得出了形而上的本体“不可知”的结论。在中国，道是属于形而上的，但它并不脱离经验性的存在，如庄子所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④。这就意味着，道对经验的超越属于内在性超越，所以它“不可见”、“不可受”，却“可得”、“可传”。

进一步说，中西思想的如此差别，是表现着理论观念上的一个重大分歧。在西方，“形而上学”（哲学）所追求的终极存在、绝对原则，被理解为一切存在的“原型”，属于先验的规定，那里已经具备后来将会存在的一切，这就像“种子”与大树的关系，只要掌握了这个种子，从逻辑上就能推论和演绎出其他一切存在来。笛卡儿就曾用大树来比喻形而上学，把哲学看作是大树的根。这种理论体现的是自然“物种”观点，物种对物具有的是“先天”的规定性。至于人的本性，在这里已被还原为与物完全同样的本性。中国哲学所理解的“道”，体现的是一种生命本性，“生命”与“物种”的区别就在于，它不是预先包含一切，而是在变化中化育万物，生成一切。按《易经》解释，“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道的“有”“无”统一性质，就表明它不是既成存在，而是代表万物生化的一种生命活力，属于生命的生命。从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西方的哲学概念能够定义、中国的哲学概念不能定义，以及为什么西方哲学的原则性强而灵活性弱、中国哲学的灵活性强而原则观念弱的原因。

这里主要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特点和与此有关的价值问题，当然很不完全，关于它的弱点、局限和缺陷问题，涉及很少。这不意味后者不值得重视。传统哲学之为传统，毕竟已经是已经过去的理论，我们处在今天的时代应当有所创新，不能再以祖宗的遗产装潢门面。本文的意思很明确，主要在于提醒：创新不能割断历史，更不能丢掉自己，何况我们还有并不比别人差的许多好东西。

〔本文责任编辑：孙 麾〕

① 《周易·系辞上》。

② 王夫之：《周易外传》卷5。

③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7页。

④ 《庄子·大宗师》。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w with rationalism as its base and legal justice as its main theoretical content treats the natural law based on the perpetual and abstract principle of justice as the highest law. Its theoretical features are embodied in metaphysics and dualism.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n conformity of 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philosophy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aw also underwent a transformation from metaphysics, speculative rationalism, absolutism and dualism to anti-metaphysics, non-rationalism, relativism and monis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wift and vigorousl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and the inherent theoretical drawbacks of Western modern philosophy of law and that the emergence of utilitarianism, ontological philosophy of law and sociological law was the real mark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5) **Thinking Peculiari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ir Value** *Gao Qinghai* ° 52 °

Humanity is a direct top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repudiation of humanity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mounts to denial of the peculiarities of Chinese philosophy. Unlike the Western case, the Chinese philosophy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perfection of nature of human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fe's inherent value, thus focusing on thinking over righteousness. Chinese philosophy lays its stress on awaking to the truth and expresses man's transcendent ideals and metaphysical pursuit through the grasping of *tao* ("the way"). As a matter of fact, what philosophy describes is not a real world (that is the task of sciences). Instead, it prescribes the criteria concerning man's views, man's attitudes and man's ideals in the existing world, how to sublimate man's nature and how to heighten man's spiritual realm. In this sense, the Chinese philosophy has its advantages.

(6) **Classics and Annotations-On Zhu Xi's Thinking on Annotations** *Pan Derong* ° 56 °

Zhu Xi was the first schola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o talk in a systematic way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reading and annotating. "Rationality" is an ontological concept of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serves as the metaphysical basis of his annotatio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i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reach a harmonious unity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lassic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sages and the meaning understood by the reader. The basic methods he used in his annotation are 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y the heart. This annotating framework represented by Zhu Xi is helpful for us in our effort to construct modern Chinese hermeneutics.

(7)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Effects of Taxation Imposed on Labor, Capital and Consumption**

Liu Rongchang Ma Shuanyou ° 67 °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imposed on income of labor and capital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on one side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ther. It also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ways the effective tax rates exert their influence on the economic growth. It is found that taxation on capital decreases the investment rate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no negative impact on labor